第52卷 第10期
2022年10月

浙 江 大 学 学 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52, No. 10
Oct. 2022

主题栏目: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的语言文字与国际传播 DOI: 10.3785/j.issn.1008-942X.CN33-6000/C.2021.06.115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的语言文字规划观

沈 骑[1,2] 赵 丹[1]

(1.同济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092;2.同济大学 语言规划与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上海 200092)

[摘 要] 政党语言文字规划观是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热点之一,也是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语言文字事业在治国理政中的基础性作用,建党百年来在语言政策与规划中积累了宝贵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因此,对其中蕴含的语言规划价值观进行凝练并总结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的语言文字规划观在建党百年的四个重要历史时期呈现出语言工具与文化的兼容、语言工具价值主导、语言规划价值观的资源转型、多元一体的语言治理观的变迁历程。这是中国共产党因地制宜进行语言文字规划理念转型的结果。语言文字规划观的迭代更新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念的革新,也彰显其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作风,而这正是一个政党的生命力之所在。

[关键词] 建党百年;语言规划;价值观;语言政策;语言治理

一、引 言

中国语言文字规划服务党和人民事业,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能力。在建党百年历程中,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语言文字的基础性作用,在语言文字规划中积累了宝贵而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对中国语言文字现代化、信息化与国际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一百多年来,在党的领导下,中国语言文字工作服务并推动党和国家事业稳步发展并走向繁荣,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语言保障。鉴往知来,在新时代全面总结与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语言文字规划的理念、经验与做法,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王建华、费锦昌和于锦恩等学者较早关注到1949年之前中国共产党的语言文字规划工作①。现有研究主要针对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语言文字规划工作,其研究进路主要有四:一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划研究,如费锦昌、王均、李宇明、苏培成的

[收稿日期] 2021-06-11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 2022-09-15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zjujournals.com/soc
[网络连续型出版物号] CN 33-6000/C
[基金项目] 国家语委重大课题"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历程中语言文字政策及实践研究"(ZDA135-13);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球治理视域下国家语言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20BYY061)

[作者简介] 1.沈骑(https://orcid.org/0000-0002-3112-2858),男,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济大学语言规划与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2.赵丹(https://orcid.org/0000-0002-6370-748X),男,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

① 参见王建华《陕甘宁边区的新文字运动——以延安县冬学为中心》,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86-100页;费锦昌《中国语文现代化百年记事(1892—1995)》,(北京)语文出版社1997年版;于锦恩《试论民国时期国共两党对汉语拼音的推行》,见张宪文主编《民国研究》总第13、14辑(2008年冬季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89-97页。

研究探讨了新中国文字改革、汉字规范、汉语拼音和普通话推广①;二是民族语言政策研究,如道布、周庆生、陈章太、刘源泉和李资源、黄行、韩江华的研究论述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和国家通用语的关系,对少数民族语言政策发展进行了梳理和总结②;三是语言生活研究,如周庆生、郭熙、李宇明分别论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语言政策研究的发展脉络、语言生活的发展走向,以及语言研究对语言生活的影响③;四是中国共产党语言文字工作成就的研究,如张日培、项开喜、文秋芳和杨佳、彭泽润等梳理了建党百年来中国语言文字工作所取得的成绩④。上述研究立足语言规划实践,关注建党百年来中国语言规划的主体、对象、内容、方式和效果,均具有重要价值,为本研究从语言文字规划观视角进行理论分析提供了重要依据和参考。

政党语言文字规划观是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热点之一,也是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指导思想。政党语言文字规划的本质是政党在特定环境下,基于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局势等因素的综合评估,制定和实施的一种重大社会规划[1]71,具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和价值定位。本研究基于国内学者对语言规划价值观的理论探讨,采用历史文献法对建党百年历程中的语言文字政策和实践史料进行梳理⑤,通过对四个重大历史时期党的语言规划价值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凝练,揭示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语言规划价值观的流变⑥。研究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语言规划价值观,不仅对党和国家在新时代制定语言和文字政策、促进语言治理、推进语言文字工作具有深刻的经验启示作用,同时将拓展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的语言学路径与视角,并开创政党语言规划研究这一新的研究领域,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二、语言规划的价值观

语言规划的价值观,是指规划主体在语言规划过程中对语言和语言规划的根本看法与价值取向,是语言政策与规划学科的关键议题。语言规划价值观揭示了规划主体如何看待语言在国家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其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语言文字规划活动有重要的指导

① 参见费锦昌《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记事(1978—2003)》,(北京)语文出版社2005年版;王均《语文现代化论丛》,(北京)语文出版社1997年版;李宇明《汉字规范》,(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苏培成《当代中国的语文改革和语文规范》,(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② 参见道布《中国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载《民族研究》1998年第6期,第42-52页;周庆生《国民政府时期国共两党的民族语言政策》,载《民族语文》2000年第1期,第30-37页;陈章太《当代中国的语言规划》,载《语言文字应用》2005年第1期,第2-12页;刘源泉、李资源《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文化政策及其启示》,载《理论学刊》2012年第6期,第37-41页;黄行《中国民族语文事业七十年》,载《语言战略研究》2019年第4期,第27-37页;韩江华《千秋伟业正风华:中国共产党民族语言文字政策百年演进历程》,载《民族学刊》2021年第8期,第36-45页。

③ 参见周庆生《中国语言政策研究七十年》,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第2,60-71页;郭熙《七十年来的中国语言生活》,载《语言战略研究》2019年第4期,第14-26页;李宇明《序:中国语言文字事业70年》,见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组编《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9)》,(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

④ 参见张日培《新中国语言文字事业的历程成就》,载《语言战略研究》2020年第6期,第17-28页;项开喜《中国共产党与百年语言文字事业》,载《中国语文》2021年第4期,第387-401页;文秋芳、杨佳《中国共产党百年语言文字工作的人民观》,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第7-15页;彭泽润、阳繁、蒋语嫣等《中国共产党把愚民变成化民领导中国语言现代化事业》,载《大理大学学报》2021年第11期,第1-9页。

⑤ 本研究使用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语言文字政策和实践的史料主要源自以下六类文献:中国共产党党史资料、党和国家颁布的语言文字政策文本、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讲话、语言文字管理机构负责人的讲话和回忆录、语言规划研究领域专家学者的著作和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领域专家学者的著作。

⑥ 本研究采用语言规划的广义定义,其中语言规划对象包含语言的规划、文字的规划和文风的规划;语言规划的内容包含中国共产党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划、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方言的规划,以及外语教育规划。

意义。政党作为语言规划主体，必然会将其政治主张融入语言文字规划活动。政党语言规划不仅关注具体的语言政策制定、出台与实施，更需要在规划过程中结合不同历史时期国家发展与社会转型语境，因地制宜地制定与调整语言规划价值观，从而推动语言文字服务于政党意志与国家社会需求。下文将首先结合国内学界对语言规划价值观的探讨，对语言规划的工具观、文化观、资源观和治理观进行概念厘定，并梳理其来源与流变。

语言规划的工具观将语言视作解决交际与沟通障碍的工具[2]2-3，从而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建设，本质上是一种实用工具主义思想。语言规划的工具观是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奉行的语言规划观念，在人类社会与经济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世纪末以来，语言规划的文化价值受到关注。语言规划的文化观关注语言的文化职能。就文化范畴而言，语言既是文化的构成要素之一，也是文化最重要的承载者，这是语言的显性文化职能；同时，语言的隐性文化职能起到身份认同、情感依存的作用[3]23。语言规划正在经历着一种多元化、差异化与生态化的规划范式转型。随着社会各界语言意识不断加强，将语言视为人类社会重要资源的规划观被正式提出。语言规划资源观更为突出语言安全价值，强调语言资源保护、开发和利用的规划共识，充分提升国家和社会的语言资源意识[4]19。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深入、社会分化的加剧和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微观语言规划逐渐兴起。这一规划新范式强调规划主体多元化、参与者协同合作，形成良性互动的语言治理。语言规划治理观被正式提出[5]85。需要指出的是，在语言规划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互动进程中，上述四种语言规划观并非以单一形式统摄语言规划的实践活动，而是以一种兼容并包，抑或是演变发展的状态呈现出来。基于语言规划价值观的分析框架，爬梳建党百年历程语言规划观的历史演进轨迹，有助于我们系统全面地把握中国共产党语言文字规划观的基本特征与规律。

三、中国共产党语言规划价值观的百年演进

基于中国共产党党史，本文将建党百年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1949）、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1978）、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8—201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12年至今）。通过梳理和分析，我们发现中国共产党的语言规划价值观随着不同时期政治、经济、社会的变革而变迁，在建党百年历程中先后呈现出语言工具与文化的兼容、语言工具价值主导、语言规划价值观的资源转型和多元一体的语言治理观的流变脉络。

（一）语言工具与文化的兼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1949）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开展了一系列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尽管当时中国正处于一个山河破碎、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语言文字的重要作用，在这一时期领导并发起了一系列语言文字运动，如白话文运动、文学大众化运动、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等。在这一阶段党的语言文字规划和实践中，语言文字被视为军事斗争的重要工具，同时也被看作阶级秩序重构的要素和宣传文化统一战线的重要抓手。语言规划的工具观和文化观成为指导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语言文字工作的主导价值观。通过分析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语言文字改革动机和目标，我们或可对其中所蕴含的语言文字规划观有更清晰的认知。

1.克服语言沟通障碍，推动思想技术传播

语言规划的工具观以解决沟通障碍为指导思想，以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为目标。这一语言规划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上有着最直接的体现。拉丁化新文字源自旅苏共产党人瞿秋白、吴玉章等人创制的拉丁化方案，其最初目的是在苏联远东地区的10万华工中扫除文盲。

随后,拉丁化新文字被引介至国内,引起强烈反响。1935年12月,688位有识之士共同撰文发表《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中明确指出方块字“难认、难识、难学”,对于扫除文盲和接受西方先进思想和技术是一种巨大阻碍,并强调拉丁化新文字的优秀工具属性和全国推广的重要性,呼吁使之成为“推进大众文化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工具”[6]66。《意见》将汉字比作独轮车,新文字比作飞机,当“坐上新文字的飞机来传布民族自救的教育的时候,就可以知道新文字是不但不阻碍中国统一,而且却有力量帮助唤起大众挽救我们垂危的祖国”[7]749,凸显其先进的工具属性。在当时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下,《意见》不仅是社会有识之士的共同心声,也得到了包括艾思奇、聂绀弩、茅盾、陈望道等知名中国共产党人的积极署名和支持。毛泽东亲自写信给《意见》的第一作者蔡元培,表达了对新文字运动的大力支持。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毛泽东表示:“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8]708通过对《意见》这一重要的语言规划纲领进行文本分析,可以明显感受到这一份中国共产党大力支持的语言纲领中蕴含的语言规划工具观,即拉丁化新文字是扫除文盲、普及西方先进思想和科技的先进“武器”。中共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吴玉章也认为,要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扫除文盲,“只有用新文字才有可能,汉字是不能负担做这个任务的”[9]392-393。尽管这种观点过于激进,现在看来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它深刻反映出当时中国共产党对新文字先进工具属性的认可。

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语言规划实践也十分清晰地反映出语言工具主义指导思想。以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推广拉丁化新文字为例,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摆脱汉字扫盲的困境。当时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开展了一系列识字运动,但汉字扫盲推进效果不彰,很多扫盲工作成了有名无实的摆设。究其原因,方块字难识、难学、难记是主要因素。一个文盲花费大量时间精力也只能学习皮毛,对挣扎于温饱线的劳苦大众而言,“是没有这些空闲时间的,也花不起许多钱来玩这套把戏”[7]747。拉丁化新文字的引入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有效解决了汉字扫盲费事低效的问题,其推广运动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持续时间长达30年,直至《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为止[10]390。周恩来总理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中指出,在谈到现在的拼音方案时,不能不承认拉丁化新文字的功劳[11]3。

语言规划的工具观还体现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翻译规划和外语教育规划中。中国共产党早在成立之初就创办了上海外国语学社,位于上海市霞飞路渔阳里6号。渔阳里作为培养党早期干部的摇篮,为早期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赴俄学习打下了语言基础,也为俄国革命经验在建党初期的引入做出了巨大贡献[12]93-94,俄语成为这一时期传播进步思想的重要工具。其中,陈望道先生作为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全译本的中国第一人[12]97,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后在延安时期,党成立了外国语学校培养外语和翻译人才,其目的是满足当时的政治、外事和军事需求,主要以培养日语、俄语和英语人才为主[12]99-110。外语被视作为战争服务的工具,如:日语作为劝降和获取军事情报的重要工具,俄语作为与苏联开展军事和政治合作的工具,英语作为党对外宣传、塑造自身形象的工具等,语言规划的工具观也指导了这一时期的外语教育规划和翻译规划。

2.塑造阶级平等文化,建立文化统一战线

除了将语言当作一种实用工具外,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语言规划中也充分利用了语言的文化职能,尤其是语言在身份认同、情感依存方面的功能。通过对相关史料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语言规划目标除了提倡运用大众说得出、听得懂、看得明白的语言文字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目标——打造新的革命主体,破除语言层面阶级不平等的格局。这一点或可从1931

年通过的《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①]中得到集中体现。这一书面方案痛斥汉字是“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的工具”，文言是“特权的言语”；而使用拉丁化方案创制“中国劳动群众口头语之书面文字”，目标在于建设“形式是民族的，而内容是国际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工人及劳动者的文化”[13]58-60。由上述表述可以看出，语言被视作不同阶级的重要身份标识，语言的身份认同和情感依存功能是这一时期新文字运动的落脚点。吴玉章在其《新文字与新文化运动》一文中认为，文字作为文化的载体，“自然也免不了当时社会阶级的反映，特别是统治阶级意识的反映”[13]31。这一论断不仅是他个人的观点，而且代表着同时期中国共产党语言文字的思想[14]80。瞿秋白则指出“国语”和汉字均为精英和官僚等特权阶级所垄断，共同体现并维护统治阶层意志，而推广拉丁化方案的重要目的之一是打破语言层面的阶级不平等的格局[13]58。

同样体现语言文化职能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大众化运动。文学大众化运动发生于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阶级政策的调整直接影响到了该运动的动机和目标。在这场阶级改造的语言规划活动中，中国共产党主要秉持两大目标：一是突出无产阶级在文学大众化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二是改造小资产阶级，解决新的革命形势下文化领域的统一战线问题，这赋予了文学大众化运动于文学和语文建设之外的多重动机和目标，即通过文学大众化运动打造革命新主体，重建阶级秩序[15]。因此，文学大众化运动是基于时局背景开展的，更多服务于阶级秩序的重构，语言的阶级身份标识属性得以彰显，语言规划的文化职能也得以体现。

语言规划文化观还体现在毛泽东对党八股式文风的批判。毛泽东认为文风能够体现出党的作风，并呼吁为了使语言更好地服务于革命斗争，忌“空话连篇，言之无物”，呼吁不要拿“言语无味，像个瘪三”似的作品向群众宣传，提倡生动活泼、鲜明有力、贴近群众的文风[16]837。文风建设事关党风建设，也是中共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语言作为中国共产党党风的文化载体属性，是中共脚踏实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理念在语言规划领域的微观投射。

由此可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语言和文字对早期的中共中央而言，既是扫除文盲、开展军事和政治合作的重要工具，也是打破语言层面阶级权利不平等局面的关键要素，更是建立文化领域统一战线的重要抓手。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语言文字规划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文字规划活动紧紧围绕“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17]861这一理念展开，并且根据政治和革命形势进行语言和文字规划的路径转换，以服务于战争、阶级斗争、劳苦大众的思想解放和知识学习，语言规划的工具观和文化观深深影响了这一时期党的语言文字工作。

（二）语言工具价值主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1978）

早在抗战结束前夕，毛泽东就指出：“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18]1083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百废待兴。因此，中共中央在这一时期主要开展了五项重点语言规划工作：汉字简化、制定和推广汉语拼音方案、推广普通话、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普查和创制、外语教育规划。这些工作主要服务于以下三个目标：其一，汉字简化、汉语拼音制定、推普是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11]，旨在扫除文盲，为国家建设提速增效；其二，民族语言普查和创制旨在消除少数民族沟通障碍，助力民族识别和行政区域划分；其三，外语教育规划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任务”，紧密服务于党和国家与世界各国的政治合作和外交。归根结底，这五项重点工作旨在迅速提升民众文化水平，扫除沟通障碍，服务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由此可见，提升民众文化水平、消除人民的沟通隔阂、开展政治合作与外交是这一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主要动因和目标，语言的工具价值凸显，语言规划的工具观主导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语言文字工作。

① 1931年在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了“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

在汉字简化方面,毛泽东早在1949年底访苏期间就曾与斯大林讨论过中国语言和文字的走向,指出汉语汉字的难学,并对斯大林提出的"语言是工具,不应是上层建筑,不应具有阶级性"的观点表示认同[19]5762。这一观点对中国文字改革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使得吴玉章、郑林曦等中国共产党文字改革核心成员对文字价值有了新认识,明确指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工具,必须属于全民[20]8。尽管繁体字也可以用于扫除文盲和全民文化普及,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急需大批人才服务国家建设,需要考虑到他们的"脑力和时间都非常宝贵,不应该有丝毫浪费",更要考虑到"劳动人民生产工作忙,没有多余的学习时间"[21]27。因此,文字改革的先驱基于简体字具备的高效工具属性,一致认为汉字简化在当时是有迫切社会需求的。在语言工具观的指导下,中共中央于1954年设立文字改革委员会,启动汉字简化改革。《简化字总表》《新华字典》先后发布、出版。政府及相关部门密集颁布了一系列汉字简化的政令,对汉字简化方案的主要内容、适用范围、推行方式等做了说明,要求"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文字改革"[22]373。党中央领导也在不同场合,以不同形式多次表达对上述文字改革工作的重视①,这为文字简化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人民日报》连续撰文,强调语言的纯洁性和规范化,代表性文章有《请大家注意文法》《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语法修辞讲话》等;中共中央也发出《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等文字缺点的指示》。这一系列评论文章旗帜鲜明地反映出中共中央对语言文字规划的态度和目的,即提升语言效率,助力国家建设。

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也是文字改革的重要部分,其制定过程亦承载了中国共产党的语言工具观。据党史资料记载,在制定汉语拼音方案时,文字改革先驱们曾就汉字注音的字母方案进行了广泛调研,共收到各类汉语拼音方案655种,其中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方案主要有三种:国际拉丁化字母、民族形式字母和苏联俄文字母方案[21]171-172。学者们也分别从便利性、民族性和中苏关系等角度对注音字母方案的选择展开了激烈争论。首先,"民族形式字母笔画繁杂,书写不便,在记录方言和拼写少数民族汉语言方面都有困难,因此不可能作为我国将来拼音文字的字母"[23]102。其次,俄文字母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的使用范围上不如拉丁字母广泛,在群众基础方面亦不如拉丁字母,故不考虑。中共中央在分析各方意见和权衡利弊后选择拉丁字母为最终方案。毛泽东同志也在重要场合表达自己对拉丁字母方案的赞成[24]59。这充分体现了中共领导人在语言规划过程中的工具价值观,也符合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

新中国成立初期,方言的隔阂在客观上给各民族、各地区人民之间的交流带来了极大阻碍,由此产生的各种问题或直接或间接地对国家各项工作造成了负面影响,成为党和国家这一时期推广普通话的主要动因。显然,这项语言规划旨在消除交际隔阂。学者崔明海从思想交流、广播宣传、农业生产、文化教育和军队建设五方面对史料进行了梳理,指出这一时期的方言分歧不仅带来沟通不畅、生产力低下的问题,还对军事训练和指令的上传下达造成困扰[25]。因此,制定和推广民族共同语,服务社会主义革命初期的国家建设成为这一时期的迫切任务。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56年1月和2月接连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文字改革工作问题的指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明确要求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毛泽东、周恩来和刘少奇等党的重要领袖也对学习普通话发表过自己的看法,毛泽东认为,"一切干部要学普通话"[23]56;刘少奇则指出:"汉民族要有统一的语言,学校要用普通话进行教学。老师在一定时期内学会普通话。今后凡是不会讲普通话的,不能

① 关于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文字改革的一些指示,可参见:《文字改革》杂志编辑部编《建国以来文字改革工作编年记事》,(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85年版,第38页;毛泽东《给马叙伦的信(1953年5月22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35-236页注释部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98页;周恩来《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1958年1月10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报告会上的报告)》,载《文字改革》1958年第2期,第3-8页。

当教师。”[6]186

除上述三大任务之外，中国共产党这一时期的语言规划工具观同样体现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规划和外语教育规划中。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规范化领域，党中央不仅在1954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明确“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还在《关于民族事务的几项决定》中提出“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帮助文字尚不完备的民族逐渐充实其文字”。同时，于1956年起开展全国民族语言普查和少数民族文字创制与改革两项工作，先后组织700多人分赴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调查语言，为10个民族创设14种文字书写系统，帮助3个民族改进了4种文字方案[26]29。其主要目的一方面是辅助民族识别、行政区域划分，助力国家管理；另一方面是消除沟通障碍，普及教育，提升民族地区社会与经济建设效率[27]。

在外语教育领域，为适应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经济发展需要，借鉴苏联先进经验，当时的外语教育采取了俄语教育“一枝独秀”的政策。进入20世纪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恶化，我国与很多西方国家和亚非拉国家陆续建交。为了顺应国际政治形势，中共中央于1964年发布《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提出大力改变俄语和其他外语人数比例，提倡大中小学外语教育“一条龙”。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外语教育规划与国际政治形势高度同步，外语教育的发展被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其“政治工具”价值由此体现。

综上，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通过自上而下推行语言规划系统工程，在开展文字改革三大任务的同时，积极普查和创制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顺应国际政治形势积极调整外语教育规划，极大提升了国家开展社会经济事业建设的效率。这一时期的语言规划主要取得了三项重要成就：一是使新中国在成立初期就摆脱了文盲率超过80%的现实困境；二是切实缓解了当时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规范问题给我国不同地域之间带来的较为严重的沟通障碍；三是为新中国政治、科技、外交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外语人才。语言规划的工具观主导了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的语言文字工作。

（三）语言规划价值观的资源转型：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时期（1978—201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经济和现代化建设为主要目标。这一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在坚持主体性原则的前提下，也重视语言多样性。一方面，主体性原则主要服务于国家改革开放建设大局。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四大和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改革和西部大开发等重大战略，语言文字工作领域延续了上一时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法制化工作，并启动了语言文字信息化进程，积极对接社会主义现代化和西部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另一方面，多样性特征则体现为将语言作为资源的语言规划观。为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十七大关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倡议，语言文字规划不仅科学看待、妥善处理一些语言之间的关系，努力构建和谐语言生活[28]，而且强化了网络语言文字治理，营造了良好的网络环境。这使得党和国家的语言文字政策呈现出“主体多样”的特点[27]。有研究分析了这一时期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颁布的多份“五年规划”，发现在党的相关政策和方针的指引下，语言文字规划观开始转型。在第一阶段（1978—2007）被看作“信息载体”和“交际工具”的语言文字，在第二阶段（2007—2012）被赋予了“国家资源”的角色，需要保护、开发和利用[29]。可见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语言规划观处于动态发展之中，逐步由语言规划的工具观向资源观过渡。

1.服务于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大局的主体性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划是这一时期党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主体。通过梳理这一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岚清、许嘉璐等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看法可以得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被视为一种交

际工具,是国家及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程度的体现[30]2。普及共同语,实现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是建立现代化国民经济体系的基础性工程和提升生产生活水平的必要条件[31]2[32]297。上述对语言文字的看法折射出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和加强现代化建设理论对语言规划的影响,语言成为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工具。

在本体规划领域,党和国家语言文字规划的工作重心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于文盲率的降低,文字改革的需求不再迫切,语言文字的规划思路由前一阶段的改革期进入稳定期,"文字改革委员会"更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和信息化成为该时期党和国家语言文字规划的主要任务[33]5。值得一提的是,在邓小平提出"三个面向"(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基础之上,语言文字的信息化工作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并在1986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上被正式确立为语言文字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地位规划领域,这一时期的工作主要针对普通话和简化字的地位规划。普通话的地位规划为这一时期的工作重心,体现在党和国家颁布的四项规定中:一是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二是1994年中共中央颁布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要求要"正确使用祖国的语言文字,大力推广普通话";三是1996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明确了新闻媒体和出版物在使用和推广祖国语言文字方面的职责;四是200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对普通话地位的明确界定。这一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对自身普通话规范程度格外重视,江泽民、李岚清、李铁映、许嘉璐、陈至立等领导人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语言规范、推普、积极参与普通话水平测试的重要作用[34]。简化字的地位规划除了体现在《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的相关条款中,还体现在以下语言规划活动和表述中,如:在胡乔木同志的关切和督促之下,《人民日报(海外版)》在1992年改用简化字出版[35]318;江泽民同志强调"汉字简化的方向不能改变,各种印刷品、宣传品尤应坚持简化字"[36]28。

这一时期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习得规划成就斐然。第一,普通话推广的要求较之前更高,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转变为"大力推行,积极普及,逐步提高",多次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将推广普通话列为这一时期的首要任务[37]12,并提出普通话成为"教学语言、工作语言、宣传语言、交际语言"的目标。同时,量化评估各行业推普工作、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举办全国推普宣传周活动也成为这一时期推普的新举措[38]40-42。此外,2000年之后的普通话推广和普及工作开始紧密对接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在西部地区大力推普。以广西为例,普通话普及率从2000年的56%、2010年的80.7%提高至2017年的84.72%[39],为广西的社会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第二,汉字习得方面取得重要成绩,由于全国文盲率的明显下降,截至2000年底,全民识字率提升至80%[40]。这一时期的汉字教育主要以学校教育为主,扫盲已不再是汉字教育规划的主要任务。

与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成功举办奥运会和世博会,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交流日趋频繁,外语成为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桥梁。为服务改革开放大局,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之下,国务院和教育部于1978年召开全国外语教育座谈会,并先后颁布了一系列以英语教育为主的外语教育规划,对大、中、小学外语教育中的语种布局、师资培训、教材建设等多方面进行指导。通过分析这一系列外语教育政策,不难发现,这一时期的外语被视为获取世界先进科技、管理等领域知识和经验的工具。因此,大规模培养懂外语的专业人才是当时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2.服务于构建和谐社会的语言资源多样性

除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划这一主体工作之外,党和国家语言规划的多样性在2007—2012年

开始显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民族区域自治法》针对民族语言文字的政策和规划在这一阶段得以完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十一五”规划》首提语言和谐理念，指出对影响和谐语言生活的一系列问题要妥善处理、科学对待[28]。国家语委颁布的多份“五年规划”内容也出现了一些令人瞩目的变化，除强调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划这一主体工作之外，还出现了“培养民汉兼通的双语人才”“妥善处理方言及繁体字使用问题、妥善处理汉语的国际传播和国内语言文字工作的关系”“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将语言文字作为一种国家资源加以保护和利用，支持濒危语言的保护抢救和弱势方言保护工作”等相关表述，明确语言文字需服务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8]2。

这一时期多样性的语言规划成绩可圈可点。在对外汉语教学方面，这一时期留学生人数大增，办学规模持续扩大。据调查，1978年至1987年接收的留学生人数要超过1950年至1977年人数的总和，共有63所学校恢复并开始招收留学生，40所高校成立对外汉语教学机构[41]53。2004年，在韩国设立了全球首家孔子学院，次年世界汉语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标志着我国对外汉语教学向汉语国际推广转变。在民族语言文字规划方面，党和政府通过制定术语标准、开发文字处理办公系统和建立民族语文数据库等举措，促进民族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和信息化发展。在保护方言资源方面，国家语委于2008年启动了中国有声资源数据库的建设，旨在采集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等有声资料，进行科学整理，合理加工，以便深入研究和开发利用。此外，在语言资源监测方面，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的建设，以及平面媒体、网络媒体、有声媒体、教育教材、民族语言、海外华语等领域语言资源的监测和研究工作也得到了强化[42]2。同时，网络语言文字治理和网络语言文字环境净化工作也得以推进。

由此看出，在1978—2012年间，中国共产党在积极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法制化“四化”建设的同时，开始从语言资源、文化软实力的视角看待语言的价值，语言规划观也呈现出转型趋势。语言规划的“主体多样性”特点既体现在我国宪法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官方政策文本中，也落实到了具体的语言实践中。这一时期语言规划的主体性对接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改革、西部大开发和加入世贸组织等重点工作，彰显了语言规划的工具观。同时，党和国家也认识到语言多样性规划在构建和谐社会方面的作用，党和国家的语言规划表现出语言资源意识，语言规划价值观的资源转型成为这一时期语言规划的重要特点。

（四）多元一体的语言治理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12年至今）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改革开放步伐加速。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新形势对党和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的制定和实践提出了更高要求，语言规划的地位和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首先，语言规划的地位显著提升。在这一时期颁布的多项语言规划政策中，“语言文字事业”的表述开始代替“语言文字工作”，党和国家的语言文字工作被提升至新的高度[29]5。其次，规划范式的根本转变。伴随着全球经济、政治格局的复杂多变和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中国共产党的语言文字工作也相应做出了调整，开始由传统的语言规划范式向语言治理范式转变。语言治理是“治理”概念在语言规划领域的应用，同时也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中“精准施策、高效协同、重视基层”的精神在语言文字工作中的反映。它具备两个基本特征：第一，语言治理以问题为导向，关注新时代我国语言生活不同层面的问题，以便精准施策[5]82。第二，语言治理强调治理主体多中心化，中央政府、地方机构、社区、学校甚至家庭均是重要的语言治理主体；治理过程强调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协同，多层级之间形成良性互动[43]60[44]65。

通过对政策文本的分析，我们发现语言治理观对这一时期语言政策的制定影响深远。以《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为例，其贯彻落实力度在这一时期得到显著增强。《规划》首次编

制了两份分工实施方案①,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个落实执行方案的语言文字“五年计划”[45]36。两份分工实施方案明确了多项主要任务,并逐一分解为若干子任务,其意义重大,凸显了语言治理理念中治理过程精准化的思想。此外,两份分工实施方案中都明确了每项任务的牵头单位和参与单位,目的是明确责任分工,遵循“政府主导、语委统筹、部门支持、社会参与”的原则。这一做法是语言治理观中多方参与和规划主体多元化精神的彰显。同样体现治理理念的语言政策还有2017年颁布的《“十三五”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规划》。在“十三五”规划之前,国家民委并未制定有关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五年计划,这一工作之前是由国家语委主要负责。国家民委首次牵头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规划,主要是为贯彻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中习近平同志关于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的部署,并强调民委在少数民族语言规划中的职责。尽管未单独发布《“十三五”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规划》的“实施方案”,但这份民族语言规划明确了具体任务和项目,以及牵头单位和参与单位[45]36。这亦能反映出中共中央在推进民族语言规划中的治理精神,即问题导向,精准施策,多部门协同合作。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11月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国发办〔2020〕30号)中多次出现“推进语言文字工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关表述,说明语言治理理念日益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

通过对2012年至今中国共产党语言文字规划实践的分析,同样可以发现,语言治理观已渗透至这一时期各个领域的语言文字规划中,对多个层级的语言规划活动的实施带来了正面影响。下文将从语言的文化职能治理、语言的本体资源治理和语言的服务功能治理三方面对党的语言治理观进行梳理和讨论。

1.语言的文化职能治理

得益于党和国家对语言标准化和规范化工作做出的不懈努力,国民的语言文字能力已获得极大提升。语言的工具职能不再凸显,语言作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纽带的文化职能日益受到重视[46]。这一时期,语言的文化职能治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价值(2020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2021年两会习近平同志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中提及)。其二,党和国家领导人积极倡导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4年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中提出),促进文明交流互鉴(2014年习近平同志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中提及),讲好中国故事(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习近平同志对《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30周年的批示)。其三,习近平同志提出改进文风的要求,提倡短、实、新的文风,因为文风能够体现党的作风[47]6-7。

这一时期具体的语言文字规划实践能够充分体现治理主体多中心化的特征。首先,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治理方面,中国共产党更多是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角度出发,关注民委、教育部门、宣传部门的协同合作,重视学校教育和语言文字规范化的建设。其次,在弘扬中华文化方面,语言文化传播工作的国际化进程明显加速,主要工作归结为四类:一是重大语言文化工程,如甲骨文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得到习近平同志的高度评价[48];二是国际中文教育,如成立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和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意在引入民间资本,助力差异化、个性化的国际中文教育;三是语言文字国际交流合作,如举办世界语言资源保护大会;四是群众性文化活动,如举办《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等。再次,在文明交流互鉴和讲好中国故事方面,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和“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等工作的开展对传播中国声音、中国立场、中国理念和中国价值起到了积极作用。以上涉及语言文化职能的工作中,每一类都可以体现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语言治理理念和多层级治理权力平等化的语言治理观。以2013年《中

① 两份方案分别为《〈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分工方案》(教语用函〔2016〕6号)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工程实施方案》(教语用〔2017〕2号)。

国汉字听写大会》为例，在这一语言文化传播活动中，国家语委和央广总台、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专家、全国重点中学团队、节目观众均为弘扬中华文化的参与者，也都可看作这项语言规划活动中的治理主体，这充分体现了新时代语言治理观中治理体系权力多中心化、治理主体之间良性互动、治理形式民主化等核心特征。

2.语言的本体资源治理

语言是一种重要的资源，每种语言都有其他语言无法替代的价值，应当像保护自然资源一样保护语言资源。党和国家在这一时期对语言资源的调查、保护、开发和利用也反映出治理的两个重要特点——对调查研究的关注和对自下而上规划路径的重视。在抢救、保护濒危语言和弱势方言方面，国家语委尝试调查语言国情，绘制语言地图，设立“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并随后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旨在进行语言生态的调查保护，防止农村语言和文化的“荒漠化”。在语言资源的监测、开发和利用方面，国家语言资源监测和研究中心通过对语言统计数据的采集和整理，调查语言的实际状态和使用状况，每年发布《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绿皮书）。还有每年的“汉语盘点”活动，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语料库、腾讯指数、搜狗输入法、清博大数据提供海量数据资源，全民参与推荐字词并投票，由专家进行评议并从专业角度解读。语言治理观中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互动的治理范式对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语言文字工作意义重大。

3.语言的服务功能治理

通过对相关政策文本和领导人讲话内容的分析，“语言服务”的概念成为语言政策文件和国家语委领导讲话的高频词之一。“服务”一词在2016年的《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和2021年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中频繁出现，相关的表述主要是（语言文字事业要）服务大局、服务教育现代化、服务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等，凸显了语言文字是服务教育、科技、经济、外交、安全等领域发展和重大国家战略的关键要素。语言服务职能具备传统的语言工具职能的底色，是语言工具属性的延伸。

语言在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国家重大战略方面离不开语言治理观的指引和语言治理体系的支持。以语言治理服务“总体国家安全观”为例，这一时期党和国家主要关注以下重点工作：推进语言文字信息化、自然语言理解等语言新兴技术的发展，服务智慧经济时代的“新基建”和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开展网络语言监测，服务社会舆情的研判；启动“国家外语人才资源动态数据库”和“语言志愿者人才库”工程，为党和国家的各类大型国际活动提供语言服务；开展应急语言服务研究和实践，教育部召开国家应急语言服务团研讨会（2020年4月22日），多方协作成立“战疫语言服务团”，为新冠疫情初期的外地援鄂医疗队提供语言服务，助力湖北患者的医疗救治、国内外籍人士的安全防护[49]等。2022年4月，国家应急语言服务团在北京正式成立。这一系列语言服务工作都对语言规划的理念、范式、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国家语言治理通过宏观、中观、微观层级的通力合作以及多元一体的治理体系为这一系列语言规划活动提供了有力支撑。

同时，语言治理观还可以从语言文字服务于国家“脱贫攻坚工程”和“乡村振兴战略”中体现出来。语言作为打破地域区隔、传播信息和技术的工具，其经济价值得以彰显。以这一时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划为例，“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加强民族聚居地区少数民族特困群体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等表述不仅出现在国家语委颁布的语言文字政策中，还出现在多份脱贫办发布的政策和文献中①。此外，语言扶贫的对象也十分明确，即面向少数民族地区和西部偏远地区，乡村振兴

① 出现“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表述的政策和文献如下：李培林、魏后凯《中国扶贫开发报告（2016）》，（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的通知》（国发〔2016〕64号），2016年11月23日；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201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贫困村驻村工作队选派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2017年12月24日。

中的语言治理更是国家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50]27。这一清晰定位不仅是对中共中央关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乡村振兴号召的响应,也是国家治理中精准施策理念在语言文字工作中的直接体现。

同样的精准施策理念还体现在以下两项语言治理中:第一,启动外语教育的“多语转向”,培养“非通”语种人才,提升国家语言能力,服务“一带一路”倡议;第二,建立“京津冀语言文字工作协作机制”和“国家语言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研究中心”,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党和国家重要的战略规划。

综上可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和国家为统筹服务“两个大局”,对语言文字规划的范式做出了重要调整。这一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不仅突出语言文字的问题意识,强调对各层级语言生活中的问题进行精准定位和高效施策,还关注自下而上、多层级、多主体协同互动的语言治理范式。语言治理理念在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的语言文字政策制定和实践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结 语

本文基于语言规划价值观理论,采用历史文献法和文本分析法对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以来语言政策和实践工作的史料进行系统梳理,对各个历史阶段的语言规划价值观进行分析和阐述。回顾与总结不同时期语言规划的特征与规律,对党和国家今后的语言文字工作有积极的借鉴意义。通过分析发现,中国共产党的语言规划价值观在百年历程中经历了语言工具与文化的兼容、语言工具价值主导、语言规划价值观的资源转型和多元一体的语言治理观的变迁历程。尽管在不同的语言规划价值观的指导下,语言规划的主体、内容、对象、范式和效果呈现出较大差异,但是中国共产党语言文字工作的“初心”始终未变——语言规划始终服务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各领域的建设和发展。此外,中国共产党在建党百年历程中能够结合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趋势,多次进行语言规划理念的更新和转型,不但体现其治国理念的自我革新,同时彰显出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作风,而这正是一个政党的生命力之所在。

我们认为,在新时代复杂多变的大背景之下,中国共产党的语言文字工作将继续秉承语言治理观中的核心理念。一方面,强化语言文字工作的问题意识,尊重调查和研究的价值,以实现问题的精准定位和方案的精准施策。另一方面,语言文字政策制定和实践活动可继续采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语言治理范式,持续推进语言文字工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对语言的文化职能、语言的本体资源、语言的服务功能展开治理,使语言文字事业持续助力党和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和安全等领域的建设。

[参 考 文 献]

[1] Cooper L. R., *Language Planning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2] 李宇明:《论语言的功能分类》,《当代语言学》2019年第1期,第1-22页。

[3] 李宇明:《语言的文化职能的规划》,《民族翻译》2014年第3期,第22-27页。

[4] 李宇明:《中国语言资源的理念与实践》,《语言战略研究》2019年第3期,第16-28页。

[5] 王玲、陈新仁:《语言治理观及其实践范式》,《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第82-90页。

[6] 费锦昌:《中国语文现代化百年记事(1892—2013)》,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

[7] 蔡元培等:《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见刘福春、李广泉主编:《回读百年:20世纪中国社会人文论争》第2

卷，郑州：大象出版社，1999年，第747-755页。
[8]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2-711页。
[9]《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成立大会盛况（1940年11月21日）》，见甘肃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四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91-398页。
[10]项开喜：《中国共产党与百年语言文字事业》，《中国语文》2021年第4期，第387-401页。
[11]周恩来：《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1958年1月10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报告会上的报告）》，《文字改革》1958年第2期，第3-8页。
[12]李传松、许宝发：《中国近现代外语教育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
[13]吴玉章：《新文字与新文化运动》，见《文字改革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8年，第27-88页。
[14]侯业智：《吴玉章与中国共产党语言文字改革》，《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8年第4期，第78-88页。
[15]张宝明：《重建阶级秩序：20世纪30年代文学大众化运动的内在动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30-40页。
[16]毛泽东：《反对党八股》，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30-846页。
[17]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47-879页。
[18]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29-1100页。
[19][苏]费德林：《在和斯大林会谈的日子里》，见张静如编：《毛泽东研究全书（家世编·海外编）》第六卷，长春：长春出版社，1997年，第5757-5770页。
[20]郑林曦：《中国文字为什么必须改革》，上海：东方书店，1953年。
[21]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秘书处编：《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文件汇编》，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
[24]叶籁士：《关于文字改革的几个问题》，见倪海曙主编：《语文现代化》第5辑，北京：语文出版社，1981年，第59-66页。
[25]崔明海：《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制定推广普通话政策的历史动因及其政治意蕴》，《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第21-27页。
[26]黄行：《中国民族语文事业七十年》，《语言战略研究》2019年第4期，第27-37页。
[27]周庆生：《中国"主体多样"语言政策的发展》，《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4期第2卷，第32-44页。
[28]赵沁平：《加强语言文字应用研究　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在"国家语委'十一五'科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语言文字应用》2007年第1期，第2-4页。
[29]赵蓉晖：《新时期"多元一体"语言政策的变化与发展——基于国家语言文字工作规划的文本研究》，《语言文字应用》2016年第1期，第2-9页。
[30]李岚清：《做好语言文字工作　为现代化建设服务——李岚清同志在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上的书面讲话》，《语文建设》1998年第2期，第2-3页。
[31]许嘉璐：《提高认识，齐心协力，搞好首届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活动——在首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语文建设》1998年第6期，第2-3页。
[32]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编：《新时期语言文字法规政策文件汇编》，北京：语文出版社，2005年。
[33]陈章太：《当代中国的语言规划》，《语言文字应用》2005年第1期，第2-12页。
[34]姚喜双：《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相关部门负责人重视播音及语言规范问题》，《语言文字应用》2006年第2期，第13-21页。
[35]《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语言文字》，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
[36]禹文：《江泽民说汉字简化政策不变》，《语文学习》1993年第3期，第28页。
[37]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政策法规室编：《国家语言文字政策法规汇编（1949—1995）》，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年。
[38]袁钟瑞：《话说推普》，北京：语文出版社，2004年。

[39] 佚名:《广西:普通话普及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学苑教育》2018年第24期,第4页。
[40] 赵婀娜、吴月:《筑牢国家发展的语言文字基石》,《人民日报》2020年10月13日,第12版。
[41] 李泉:《中国对外汉语教学七十年》,《语言战略研究》2019年第4期,第49-59页。
[42] 赵沁平:《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开创语言文字工作新局面,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做出积极贡献——在二零零八年度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节录)下》,《语言文字周报》2008年3月19日,第1版。
[43] 李宇明:《语言治理正当时》,《山东人大工作》2020年第5期,第60-61页。
[44] 沈骑、康铭浩:《面向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语言治理能力规划》,《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第64-74页。
[45] 文秋芳:《国家语言治理能力建设70年:回顾与展望》,《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第30-40页。
[46] 田学军:《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高质量推广普及》,《光明日报》2021年10月10日,第5版。
[47] 习近平:《努力克服不良文风 积极倡导优良文风》,《民主与科学》2010年第4期,第6-9页。
[48] 习近平:《习近平致甲骨文发现和研究120周年的贺信》,见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组编:《语言生活皮书——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报告(2020)》,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3页。
[49] 焦以璇:《"抗击疫情湖北方言通" 助力医患交流无障碍》,2020年2月14日,http://gz.people.com.cn/n2/2020/0214/c358161-33794754.html,2021年6月11日。
[50] 银晴、田静、苏新春:《语言何以助力乡村振兴》,《语言战略研究》2022年第1期,第25-35页。

Orientations in Centennial Language and Script Planning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hen Qi[1,2] Zhao Dan[1]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2. Center for Language Planning and Global Governance,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Abstract: Language and script-related issues ar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caus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Chinese people's well-being. Language and Script Planning is one of the major concerns to be addressed in assessing the nation's governance capability and its modernization as a nat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accumulated valuabl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language and script planning in the past 100 years. Therefore, a systematic review is critically important for the Party's policy-making in language and script planning in the new era. Previous literature has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in exploring the agents, contents, objects, approaches, and effects of the language and script planning exercised by the Party, which are especially conducive to the analysis of the its orientations during the past 100 years. A review of the orientations adopted by the Party not only allows us to retrospect on this unique facet of history but also facilitates the internalization of the valuable experience from our predecessors.

Orientation refers to a complex of dispositions toward languages and their roles in society in language and script planning. It reveals how language and script planning per se is perceived by a political party, and the fundamental role of the language(s) within a particular socioeconomic context. These perceptions may be largely unconscious and implicitly specified, yet they are at the most fundamental level of arguments about language and its planning. Orientations in language planning, therefore, oversee the language and script planning process as well as its activities conducted by a political party. Drawing on theories of language planning orientations proposed by major scholars, we

established four orientations as our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 for further analysis: language-as-tool, language-as-means-for-cultural-adaptation, language-as-resource and governance-oriented language planning orientation. Based on crucial documentation such as public and language policy documents, speech memos of important political leaders, archives concerning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history, and scholastic discussions regarding language planning in China,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orientations in language and script planning adopted by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past 100 years, and reveal the orientation shift and developmental trend chronologically.

Drawing on text analysis of the aforementioned historical documentation, this paper reveals that the orientations of language and script planning adopted by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ve witnessed substantial changes in the four critical historical periods. Language and script planning was first conducted for a combination of instrumental and cultural purposes within the period of 1921−1949, and then for instrumental-dominant purpose in serving the nation's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between 1949 and 1978. In 1978−2012, the orientation witnessed a transition from instrumental-dominant planning to resource-oriented planning, which was followed by a governance-oriented language and script planning approach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era in 2012. Notwithstanding the changes of orientations, the invariable focus of language and script planning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always been to serve the country's national safety, ethnic solidarity, and its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n the other hand, the shift of orientations in the party's language and script planning did not take place without weighing up the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text of the corresponding periods of time. This not only demonstrates the Party's capability of self-renovating and advancing with times, but also exhibits its fact-based approach and pragmatism-oriented governance style, both of which are of enormous significance in maintaining a political party's vitality.

Key words: centen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anguage planning; orientation; language policy; language governance